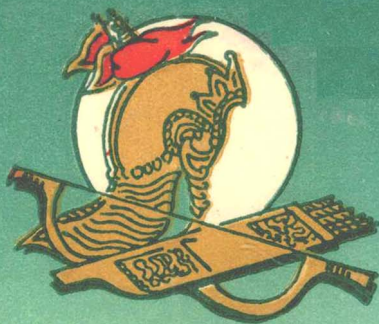


《格萨尔》 与藏族部落

何 峰 著



《格萨尔》与藏族部落

何 峰 著

《格萨尔》与藏族部落

何 峰 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宁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300千

1995年12月 1 版 1995年1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200

ISBN7-5420-0613-4/Z·8

定价： 精装30.00元 平装20.00元

序 言

陈庆英

在藏学研究中，对《格萨尔》的研究可以算是一个十分独特的领域。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当藏族历史、宗教、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还处在准备和启动阶段时，《格萨尔》的研究就一马当先，有过独领风骚的辉煌年代。当时，少数民族文学是文艺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在那种形势下，作为藏族民间文学瑰宝的《格萨尔》受到特别的重视，自然在情理之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都关心和过问《格萨尔》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工作，而以青海省委宣传部和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进行的《格萨尔》的调查、搜集、翻译、整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196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格萨尔》的《霍岭大战》之部，成为当时搜集整理《格萨尔》工作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在紧接而来的“文革”十年动乱中，《格萨尔》被打成了“大毒草”，对《格萨尔》的批判，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的打击，在青海省也是最严重的。1979年《格萨尔》得到平反，《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甘肃、四川、西藏、云南等省区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1980年到1984年召开了四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

以后又多次召开全国的和国际的《格萨尔》学术讨论会，1986年还召开了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对一部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以国家的力量加以这样的重视和支持，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应当说也是十分罕见的。

《格萨尔》受到学术界、文艺界和人民群众这样的重视和欢迎，在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中，可以说也是极少见的。八十年代中，全国出版的藏汉文本《格萨尔》及研究专著，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再加上戏剧、电视、广播节目中的《格萨尔》节目，学术刊物和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格萨尔》的文章，说八十年代出现过《格萨尔》热，也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先生编选的《格萨尔学集成》（已出四大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1994年版），可以说是一套重要的应运而生大型学术资料汇编。不过我认为，这套大型资料的出版，并非《格萨尔》的整理研究已进入了最后总结阶段，恰恰相反，也许应该说正标志《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以政治形势或社会上下各方对《格萨尔》的态度来划分，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划分《格萨尔》研究工作的阶段，就会看到，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格萨尔》的整理和研究已登上一个新阶梯。在此之前，引发和推动《格萨尔》的整理和研究的，主要是文艺界、学术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一藏族民间文学精品的喜爱和热情以及宣传领导部门的引导和鼓励。《格萨尔》所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的战争和社会生活，使之对现代文学工作者和研究者具有特别的神秘感和艺术魅力；同时，《格萨尔》内容之庞杂，篇幅之长，数量之大，又使研究者所提出的各种假设和分析往往都能从中找到自己赖以立足的依据。对《格萨尔》的主人公，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文学虚构

的不同说法，前者之中又有岭土司说、喃厮啰说、吐蕃赞普说等；对《格萨尔》的宗教思想，有扬苯抑佛说和扬佛灭苯说、佛苯融合说等，如此截然对立的的不同说法，《格萨尔》似乎都宽容地给它们提供证据，使它们都不至于显得完全地毫无根据。有的学者调侃说，《格萨尔》好比是一个宽容的教师，给学生的试题从来都是让你既能回答得出，又答不完整；它给学生判卷，没有全对号，也没有全错号，只有半对半错号。正因为如此，《格萨尔》对研究者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吸引力。然而，《格萨尔》对它的研究者并没有设置很高的门槛，读过一些《格萨尔》的人（甚至不必是读藏文原文，读过一些汉译文也可），甚而至于读过若干介绍和研究《格萨尔》的文章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抒发自己的见解，开展自己的研究。这又正如有的学者开玩笑所说，对《格萨尔》，不是读完了再去研究（因为《格萨尔》还在不断丰富和创造，还没有人能够宣布自己读过完全的《格萨尔》），而是研究起来再去阅读。因此，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八十年代及其以前，《格萨尔》的整理和研究是热情多于思考，假设多于实证，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多于解答已提出的问题。这些特点正好表明，虽然《格萨尔》的整理研究到八十年代后期已是累累硕果以至于《格萨尔学集成》也已经隆重推出，但是从学术研究的实际来说，《格萨尔》的整理和研究要够到“集成”的路碑，还要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程。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随着藏学研究各个领域的进展，《格萨尔》的研究者开始拿出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绛边嘉措教授的《〈格萨尔〉初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和王兴先教授的《〈格萨尔〉论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应该说是《格萨尔》的整理和研究进入深入阶段的标志，而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何峰同志的这本新著作《〈格萨尔〉与藏族部

落》，则应该说是紧随他们之后的又一部研究《格萨尔》的重要成果。

《格萨尔》早就被称为“著名的藏族民间史诗”、“伟大的藏族英雄史诗”，不过对于“史诗”，似乎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按文学理论的解释，“史诗”有两种：一种是用其本意，是指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是在古代民间产生的英雄歌谣、历史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大型叙事诗。它内容广阔，塑造著名的英雄形象，反映古代社会的道德、风俗、信仰等许多领域，篇幅巨大，结构宏伟，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世界上著名的史诗有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玛哈婆罗多》等，中国则有《格萨尔》、《玛纳斯》等。一种是后来的具有宏伟规模、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社会面貌的优秀文学作品，常被誉为史诗或史诗式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很显然，《格萨尔》并不是“史诗式的作品”，它只能是前者，是反映古代社会的史诗。这里的古代，应当是原始社会的末期到阶级社会的早期，即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是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的时代。部落联盟和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各种英雄史诗所反映的共同的主题，因此史诗的艺术形式只能产生和存在于人类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阶段，是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格萨尔》尽管杂有不少后来的宗教内容和历史事件的影子，但是其主要内容只有从藏族游牧部落的社会生活去理解，才能掌握研究《格萨尔》的主要线索。

熟悉《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研究者都会看到，《格萨尔》的流传地域并不是整个的藏族地区，实际上《格萨尔》最为流行的是西藏北部牧业区和昌都，以及四川甘孜、阿坝和青海、甘肃的藏族牧业区。《格萨尔》的说唱艺人，也差不多都来自这些

地区。从社会组织形式看，这一片地区正是藏族部落社会的形式和内容保存得最多和最完整的地区。在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庄园普遍建立的地区，氏族部落早已只是一种模糊的历史记忆，农奴制庄园中的农奴已很难把自己对农奴领主的人身依附和支差纳税的生活与部落成员的生活联系起来，农奴制庄园中已经难以产生出说唱《格萨尔》的艺人。从这里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出，甘青川和藏北地区部落组织的形式长期延续，是《格萨尔》能够长期广泛流传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地区藏族部落组织逐步加入地缘的和阶级的内容，又是《格萨尔》不完全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英雄史诗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的研究具有何等紧密的联系。《格萨尔》为藏族部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系统的研究资料，而藏族部落社会的研究又为《格萨尔》的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研究越是深入，这二者的联系就显得更加重要。何峰同志的这项研究，正是在这里具有了独特的重要性。

何峰同志是1987年青海民族学院藏文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以桑杰教授和祁顺来教授为师研究藏族文学。他和祁顺来教授编注的《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曾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受到各界好评。1987年后何峰同志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工作，我们曾一起参加《藏族地区社会历史和佛教寺院调查研究》（“七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工作，编写了《中国藏族部落》和《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两书。现在，他又将对《格萨尔》的研究和对藏族部落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写出这一部新的研究著作，并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们期待着本书的出版会对《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的研究起到推

动作用，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对《格萨尔》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995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一面镜子	(1)
第二章 部落社会简明的政治	(22)
第一节 领袖人物	(22)
第二节 盟誓制度	(36)
第三节 权力机关	(50)
第三章 部落的重要纽带——传统习惯法	
.....	(64)
第一节 婚姻家庭习俗	(64)
第二节 三大习惯法	(86)
第三节 各种纠纷及其处理方式	(103)
第四节 内外强制措施	(121)
第四章 部落的重要支柱——军事	(137)
第一节 兵役制度	(137)
第二节 武器装备	(155)
第三节 部落战争	(178)
第四节 战略战术	(196)
第五章 部落的经济活动	(211)
第一节 生产资料所有制	(211)
第二节 农业	(225)
第三节 狩猎业	(236)

第四节	畜牧业·····	(250)
第五节	手工业和商业·····	(268)
第六章	部落的传统文化·····	(287)
第一节	宗教·····	(287)
第二节	巫卜·····	(303)
第三节	伦理道德·····	(320)
第四节	文体体育·····	(334)
后记	·····	(355)

第一章 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一面镜子

世居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中间流传着一部世界上最优秀的诗篇，这就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迄今为止，已经发现《格萨尔》约200部，诗行达百万之多。如此宏篇巨帙的史诗，在世界上十分罕见。《格萨尔》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天下之事，包罗万象，是一部名符其实的藏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格萨尔》展示岭、霍尔、姜、门、大食等数十个势力集团的活动，每个势力集团人数成千上万甚至百万以上，仅仅提到的人名就达数千之多，它表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场面。无论从篇幅、结构上看，还是从内容、思想上看，《格萨尔》是世界史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不可朽作品。

《格萨尔》史诗以一则美妙的神话开篇。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国里住着白梵天王，他的妃子名叫绷迥婕毛。天王夫妇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东尕，次子东雷，幼子东主尕尔保。他们兄弟三人都是好样的，尤其是东主尕尔保，虽然年幼，但聪明英俊，臂力过人，诸般武艺，样样精通。这时候，下界人间，正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妖魔鬼怪，到处横行，善良无辜的百姓备受欺凌迫害，不能安居乐业。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怜悯人间苦难的百姓，和白梵天王商量，派遣他的一个儿子下凡人间，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救护生灵。天王虽然同意派子下界，但不便具体指名，于是让他的儿子们自行商定。他们兄弟三人经过射

箭、抛石头、掷骰子等比赛，最终下界的任务落到东主尕尔保身上。绷迥捷毛得知东主尕尔保要下凡，便告诉他，人间不像天国幸福，先下去看看，如果确实太苦，就另外找人顶替。于是，东主尕尔保变成一只鸟，飞到人间去察看。回到天国后，向父母禀报他所看到的情况，下决心要到人间，为民造福，并向父母索要马匹、弓箭、盔甲等物，之后立即死去，投生人间。他投胎于岭尕的僧隆家中，出生之后取名角如，少年时代赛马称王，成为岭尕的首领，尊号格萨尔。格萨尔取珠牡为妻，并有梅萨等妃嫔。有一年，格萨尔闭关静修，北方魔地的鲁赞魔王趁机掳走其梅萨妃子，格萨尔得知，前往北方降魔救妻；期间霍尔白帐王又掳去其珠牡王妃，格萨尔回来后又征伐霍尔。从此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格萨尔一生戎马倥偬，统领岭尕兵马，先后与北魔、霍尔、姜、大食、门等数十个集团作战，并获得胜利，最终将诸部统一于岭尕治下。至此，格萨尔的使命已经完成，便返回天国。《格萨尔》史诗主要讲述格萨尔统兵作战中降妖伏魔、抑强扶弱的故事。

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年代，是学术界十分关注并长期争论的难点问题之一，对此至今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源头相当久远。

吐蕃历史上曾出现过42位赞普，其中几位赞普对藏族历史有过重要影响。涅赤赞普是第一位赞普，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二百年，凡藏文史籍一般从他开始正式记载藏族历史。拉托托日年赞是第28任赞普，他是公元六世纪前后的人，据说在他执政时期佛教传入西藏，因此他被尊为第一代法王。松赞干布是第33任赞普，他具有雄才大略，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缔造吐蕃王朝，政绩显赫。朗达玛是吐蕃末代赞普，公元九世纪中叶在位，由于他严厉禁止佛教，激化了吐蕃王朝固有的矛盾，致使吐蕃王朝崩溃，

佛教在西藏本土濒临绝迹，造成西藏佛教史上的“百年黑暗时期”。藏文史书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年赞“以前凡27代，均以仲、德、苯三者司政”^①。这里所说的“仲”指寓言、神话、故事等，“德”指谜语，“苯”指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苯教。以上述三者司政，就是说它们在当时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谜语由谜面、谜底两部分组成，前者提出问题，后者对此给予解答，其特征是解释和答复一些问题，以“德”司政就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和自然现象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被认为是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做些预测性的事情，诸如占卜等。当时的苯教是一种名叫笃苯的没有教义、见地的原始宗教，其内容“只有下方作镇压鬼怪，上方作供祀天神，中方作兴旺人家的法事而已”^②。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苯教的这些功能足以参与政事并发挥充分的作用，此即为以“苯”司政。那么以“仲”司政是怎么回事呢？人类自身的一些重要活动需要记录下来，并作为历史传播下去，但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只有靠记忆来完成，因此需要有人去做这种事情。他们一方面记忆重大活动和事件，另一方面在必要时常常讲述给人们，通过这种形式代代相传。同时，古代人们往往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给予天真的解释，并表达一种美丽的向往，形成神话。它是人类早期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需要由那些记忆和讲述历史的人们负责搜集、记忆和讲述。由此形成一些专门从事记忆和讲述的人，而他们所讲的内容就是“仲”即故事、寓言、神话等。以“仲”司政，就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历史、神话，从而达到借鉴和教育的目的，最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作。藏语称《格萨尔王传》为“格萨

①《智者喜宴》（藏文）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66页。

②《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94页。

尔仲”，意为格萨尔故事，民间直接称为“仲”，把说唱《格萨尔》的人叫“仲堪”；说唱《格萨尔》的过程称作“仲瓦布巴”，意为降神说故事，即有些人据说被鬼神附体后才能说唱《格萨尔》故事。我们虽不敢妄言当年用于司政的“仲”就是后来广为传唱的《格萨尔》，但可以看出二者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第一，《格萨尔》史诗也以职业人员说唱的形式代代相传，其内容按最简单的方法分类，主要也是由历史和神话两部分组成。《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从中受到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吸取精神营养。《格萨尔》鼓舞人们勇敢地与大自然作斗争，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可见，《格萨尔》与当年用于司政的“仲”在流传形式、主要内容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还有相同和一致的地方。第二，历史上的统治者以“仲”、“德”、“苯”三者司政，三者在当时的社会上并存而且共同为社会发挥作用，应该说彼此之间是相通的。《格萨尔》常用大段文字就山川的成因、地名来源、建筑历史、人名的内涵、彼此间的关系等相互提问、回答，或者自问自答；各势力集团内部盛行占卜之风，就未来进行预测。这些都是当年以谜语形式解释有关问题的写照。根据《格萨尔》记载，苯教在霍尔、大食、松巴、门、姜等集团内部盛行并参与政事，甚至在岭内也有一定的势力，这是当年苯教司政历史的延续以及对它的反映。这些都是“仲”对其当年的同伴“德”和“苯”的一种记忆。而《格萨尔》对苯教的贬抑态度，可能是退出政坛后的“仲”对于继续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苯”的一种不平衡心理的表现。第三，《格萨尔》谈到，晁同有个仆人名叫“穆琼卡德”。这一名称具有一定的含义，“穆琼”为小人物之意，“卡德”是口才好或者善于辞令的意思，这个名字的完整含义就是善于辞令的小人物。

这个名字代表了其主人的地位和才能。穆琼卡德论地位低于晁同，常常为晁同牵马坠镫，听从其使唤；但穆琼卡德口齿伶俐，才思敏捷，经常出入于公众场合，在集会上发表一些寓意深刻、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言论，曾多次肩负重任，出使外交，深得众人喜爱和器重，有时连晁同也要对他谦让三分。《格萨尔》中的各集团都有穆琼卡德式的人物在活动。同时，史诗中经常提到这样一句谚语：“口齿伶俐者为首领，手脚灵巧者为仆人。”这些就是当年以“仲”司政、说“仲”的人参与政事的影子。所以，我们认为，当年用于司政的“仲”就是《格萨尔》的历史源头。而以“仲”司政的历史并不是像史书所说的那样在拉托托日年赞时代就已经结束，而是延续到了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创造文字、制定法律的公元七世纪。那么，根据藏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公元七世纪之前已经在社会上孕育了一部伟大的史诗。

《格萨尔》史诗内容极其丰富，但就其形成年代可供我们进行考证性研究的比较可靠的资料唯有宗教问题。读过《格萨尔》史诗就会发现，其绝大部分说唱本所表现的宗教信仰比较混杂，有苯教信仰，有佛教信仰，还有其他信仰。但是，有一种倾向，即试图用佛教来统一社会各个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而在佛教之中则尤以宁玛派为主。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创始人莲花生被尊为格萨尔的主神来颂扬，甚至说格萨尔就是莲花生的化身，格萨尔的一言一行代表了莲花生的旨意。格萨尔无论讲话还是作歌，必先提及莲花生，向他祈祷，请求保佑，其崇拜极其虔诚。历史上的莲花生是印度佛教的一位密宗大师。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后于八世纪中叶再次遭到强有力的抵制，因此信仰佛教的赞普赤松德赞派人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前来西藏帮助发展佛教事业。他们来到西藏之后，主持创建了藏族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剃度俗称“七觉士”的七名藏族青年出家为僧，成

为藏族历史上第一批佛教僧人。从此，印度佛教在西藏渐具势力，最终战胜当地的原始宗教和从汉地传入的佛教，成为西藏的主要宗教，又经过斗争和发展形成藏传佛教。从公元十一世纪起，藏传佛教内部分化，出现各种宗派，而莲花生所传的宗教则成为藏传佛教最早的教派即宁玛派。紧接着又先后出现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若干大的教派，这些教派无论其宗教体系本身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不亚于宁玛派。噶当派也是一位印度高僧——阿底峡在藏地所传，在修学体制、寺院规模等方面都超出了宁玛派。萨迦派僧人的上层与元王室结成供施关系，曾左右元王朝，统辖藏区，号令藏民，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噶举派是诸派中体系庞大、分支最多的一派，俗有四大派八小派之分，尤其米拉日巴等高僧名扬藏区，其道歌、传记流传颇广。此派首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承袭制度，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格鲁派后来居上，以致形成全藏区性的政教合一体系。那么，在这些影响巨大、为数众多的教派之中，唯有宁玛派及其创始人莲花生大师在《格萨尔》中得以充分的反映，而其他教派及其领袖人物在史诗中没有更多的表现，这说明了什么呢？在藏传佛教的教派之林中，唯有宁玛派对它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足以说明，《格萨尔》史诗的主体就在宁玛派盛行于藏族社会之时已经形成，宁玛派之后的其余教派虽然对藏族社会有过重大影响，但《格萨尔》对它们没更多的反映，这就表明在这些教派形成并盛行之时，《格萨尔》的大规模的创作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在各教派之中唯有宁玛派与分化为若干不同宗派之前的藏传佛教联系最密切，所以，藏传佛教的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的形成年代虽然不比宁玛派晚很多，但由于在其历史上没有像宁玛派那样的时代背景，也就难以和《格萨尔》发生更多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格萨尔》史诗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已经